

史海撷珍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”王安石《元日》勾勒出宋代新年的鲜活气象。这份浸润烟火的年俗，在中华大地绵延三千余年，春节早已成为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文化标识之一。从谷物丰收的原始庆典，到时序更迭的礼仪规范，再到万家团圆的精神寄托，年俗在岁月中沉淀、演变，藏着中国人对天地的敬畏、对先祖的追思、对生活的热爱，更藏着农耕文明延续至今的文化根脉。

汉简藏烟火 年俗韵悠长

文/赵媛媛 张春生

一

“年”，本义即谷物成熟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年，谷熟也。”上古农耕社会，生产力低下，谷物一熟周期与太阳回归年大致相合，“年”便成为时序更替的重要节点。对先民而言，五谷丰登是生存的根本，旱灾、水灾、冻害、虫害随时可能摧毁一季收成，因此每一次谷物成熟，都值得倾尽心力庆祝。丰收之时，人们燃起篝火，献祭神明，感谢天地馈赠，期盼来年风调雨顺，这便是年节最初的雏形——以自然感恩为核心，以生存祈愿为底色，是先民对抗未知、拥抱希望的仪式，也是年俗孕育的社会心理基础。

再后来，古人的过年不仅承载着辞旧迎新的期盼，更藏着一套浸润礼仪与温情的生活仪式。史籍中，春节作为统一的岁首节令，其节俗体系较早的完整记载见于北周时期（公元6世纪中叶），那时的过年已是家庭团聚、庆祝、祭祖、拜亲的节令，仪式感贯穿整个岁末年初。腊月初八起，“年味”便悄然弥漫：备年时，家家户户扫尘、备粮、酿酒，扫去旧岁尘埃，备足新年物资；迎新时，贴门神、挂桃符；接年时，备佳肴、祭先祖，摆上五谷、鲜果；守岁之夜，灯火通宵不灭，家人围坐话家常，告别旧岁疲惫，迎接新年曙光；元旦清晨，晚辈向长辈拜年，长辈赠予压岁钱，邻里间互道祝福，暖意融融；直至送年，年节仪式才算圆满落幕。南北朝北齐魏收《腊节》“凝寒迫清祀，有酒宴嘉平。宿心何所道，藉此慰中情”，描摹腊日寒天祭祀祈福、置酒抒怀的情景；唐太宗李世民《守岁》“暮景斜芳殿，年华丽绮官。寒辞去冬雪，暖带入春风。阶馥舒梅素，盘花卷烛红。共欢新岁岁，迎送一宵中”写尽宫廷守岁的盛大与温情。民间的年俗虽无宫廷奢华，却多了几分烟火温情，家家户户的灯火、笑语，汇成最动人的年景。

守岁是除夕核心习俗，最早见于西晋周处《风土记》，最初以燃灯通宵、照岁驱邪为主，后世附会“年兽”传说，更添民俗色彩。传说“年兽”凶猛，每至除夕便出伤人，唯有火光、声响能将其驱赶，因此人们燃灯烛、通宵不灭，称“守岁火”“照岁”，有的还在床下点灯“照虚耗”，祈求来年财源充实、家宅安宁。孩童所得“压岁钱”，雏形为汉代“压胜钱”，铸有吉语图案，唐宋时成为春节专属民俗信物，寓意驱邪避灾、护佑孩童平安成长。唐代孟浩然“守岁家家应未卧”，道尽羁旅之人对故乡团圆的牵挂，无论身在何方，除夕之夜的灯火与思念，总能跨越山海，联结起每一个家庭。

子时一到，爆竹声划破夜空，年节的热潮达到顶峰。南北朝时，尚无火药，人们便将竹子截段燃烧，借竹节爆裂的巨响辟山臊恶鬼，这便是“爆竹”的由来。宋代火药在民间普及，工匠们以纸裹硫磺、硝石，制成爆竹，燃放时声响清脆、烟火绚烂。南宋后更有编

索成串的鞭炮，一燃便响个不停，寓意“节节高升”“岁岁平安”。范成大《爆竹行》“一声两声百鬼惊，三声四声鬼巢倾”，生动描绘出爆竹驱邪的民间年节寄寓。而随着时代演变，爆竹的驱邪寓意逐渐淡化，更多成为辞旧迎新、烘托年味的象征，那一声声炸裂，是对旧岁烦恼的告别，也是对新年美好的期许。

汉代以后，年节走亲访友、互访贺渐成习俗；宋代礼仪愈发完备，已用名片拜年，称为“飞帖”。各家门前贴一红纸袋，上写“接福”，即承接飞帖之用。《清波杂志》载：“元祐年间，新年贺节，往往使用佣仆持名刺代往。”到明代仍然如此。文徵明《拜年》诗云：“不求见面惟通谒，名纸朝来满敝庐。我亦随人投数纸，世情嫌简不嫌虚。”清代《燕台月令》也形容北京“是月也，片子飞，空车走”。现代的贺年片、贺年卡，可以说是其遗风。既传递了祝福，又省去了奔波之苦；明代出现“团拜”，达官贵人集体拜年，民间纷纷效仿，邻里、亲友齐聚一堂，互道祝福，热闹非凡。这一时期，庙会、花灯、杂耍等娱乐活动兴起，成为年节的重要组成部分：庙会上，小吃摊香气四溢，糖画、面人、皮影戏引得孩童欢呼；花灯会上，各式花灯争奇斗艳，龙灯、凤灯、莲花灯，流光溢彩，游人如织；杂耍表演中，舞龙舞狮、踩高跷、变戏法，精彩纷呈，欢声笑语不断。清代姚文瀚《岁朝欢庆图》便绘出闹市灯会的盛况，花灯与爆竹声、欢笑声交织，将年味推向顶峰，也让年俗从单纯的祭祀、团圆，增添了更多娱乐与社交的色彩。

二

春秋战国至汉初，部分历法以十月为岁首（如秦历、汉初沿用秦制），律历家将天气渐冷、阴气上升之时定为新年开端，十月元旦也称“过冬”。直到汉武帝元封七年（公元前104年），颁行《太初历》，正式改以正月（寅月）为岁首，确立了后世沿用两千余年的正月初一为新年开端的历法格局。这一天，庙堂贺岁相庆，民间守岁迎新。

1990年在敦煌清水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西汉地节元年（公元前69年）历谱简册，是目前所见最完整的汉代实用历谱之一，现存27枚，单枚简长36.10—37.10厘米，宽0.60—1.30厘米，尚存两道编绳，为木质编册横读式，汉隶字迹清晰，现藏于敦煌博物馆，为国家一级文物。

《太初历》记载，一年等于365.2502日，一月等于29.53086日，以太阳回归年为主、月亮朔望月为辅，首次将二十四节气纳入历法，调整了太阳周天与阴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。其沿用十九年七闰法，却一改过去置闰混乱，以无中气之月为闰月，这一规则延续至今，是我国历法史上划时代的进步，彰显当时天文与气象观测的最高水平。

西汉中期以后，二牛抬杠重犁普及、铁器锻造成熟、耕作技术进步，加之《代田法》推行，谷物产量大幅提升，人们逐渐摆脱饥馑威胁。年节也慢慢淡化早期自然感恩与泛神崇拜，被赋予更多人间烟火的温情。

“愿得长如此，年年物候新”，“年”是时令分界，更是希望起点。从西周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“朋酒斯飧，曰杀羔羊。跻彼公堂，称彼兕觥”的岁尾祭饮——先民以新谷酿酒、肥羔祀神，举兕觥共祝长寿，这是春节礼俗最古朴的雏形，到明清“花灯匝地连



古人欢度新春的场景。清·丁观鹏绘《太平春市图》

过年合家欢、庆团圆的场面。清·姚文瀚绘《岁朝欢庆图》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

星汉，箫鼓喧天沸市声”的繁华，古人的春节从来不止是时序节点，更沉淀着慎终追远的敬畏、阖家团圆的温情。

《太初历》赋予过年的，不仅是固定时序，更是农耕文明的精神锚点。闰月制度让历法岁时紧随农时，正月岁首将辞旧迎新与春耕启蛰紧密相连。百姓新年祭祖，是感恩过往丰收；孩童燃放爆竹，是期盼来年安宁；邻里互道祝

福，是珍视时序安稳。这些习俗在大初历的时序框架中沉淀，成为华夏民族跨越千年的文化基因。

如今，我们以正月初一的饺子开启新年，这份两千余年的时序之约，早已从历法规定化作血脉中的乡愁与期盼。太初定岁首，为岁月立标，更让每个新年都成为万象更新的起点，春归之时，总有心安之处。

三

汉简里的年，藏着可触可感的烟火温度。汉代腊祭是新年开端，全国各地举行隆重祭祀，祭百神、祈丰年、送旧迎新、纳吉祈福，腊祭前后，官方与民间皆宴饮聚会。居延甲渠候官遗址出土的16枚木简，详细记载东汉初年，甲渠候官腊月给戍边将士发放腊钱的情况：“不侵隧长石野，腊钱八十，十二月壬戌妻君宁取，吞北隧长吕成……”腊祭前，官府下发文书，明确活动要求，各地依令筹备。

“见(现)吏、施刑、腊用肉致斤……”这份汉简账本记载，腊祭结束后，地方官府为百官、在职官吏及服役施刑者分发腊肉，还为戍边士卒、乡里民众发放腊钱或腊肉，堪称后世“年终奖”与“压岁钱”的雏形，让戍边士卒也能感受节日慰藉，尽显汉代官府对戍边之人的关怀，对河西边塞士卒而言，这更是改善伙食、丰富生活的“好日子”。

贴春联是过年最具标志性的习俗，即王安石笔下“总把新桃换旧符”。春联源于“桃符”，最初古人在大门两侧悬挂桃木板，或书或画“神荼”“郁垒”二神，用以辟邪镇妖，后逐渐演变为书写春联、岁旦更换的习俗。

传统上，五代后蜀孟昶“新年纳余庆，嘉节号长春”被视为传世最早的春联。而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中，已发现早于孟昶两百余年的唐代桃符题辞：“岁日：三阳始布，四序初开。福庆初新，寿禄延长。又三阳口始，四序来祥。福延新日，庆寿无疆。”内容为新春祝福，以四言对仗写成，需“书门左右”，是目前所见更早的春联雏形。此外，古人还在门户插“人面木辟邪”，驱邪纳福。从木辟邪到桃符，形式更迭，守护家宅安宁的祈愿始终未变。

从西周岁尾庆典，到汉代边塞腊祭分肉，到唐代敦煌桃符题辞，再到明清灯会社火，古人年俗根植于农业文明对时序的感知、对天地祖先的感恩、对社群团聚的渴望，始终围绕着“团圆”“祈福”的核心。

今天，甘肃正月十五社火、九曲黄河灯阵，乃至天水手工长面，都是千年文脉的鲜活延续。形式虽变，对家庭的珍视、对美好的期盼从未改变。正如王安石笔下“千门万户瞳瞳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，无论时代流转，春节始终是中国人最隆重的仪式，这份藏在烟火里的精神密码，代代相传，成为民族永恒的文化印记。